

书评

Book



阿里吉以三个传统 探究中国奇迹根源

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者应对国家腐败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阿里吉指出,中国成年人人均寿命的较大幅度提高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就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成就是基于毛泽东时代非凡社会成绩的观点。可惜的是,到了90年代后期,因为贫富分化,人们对改革日益不满,这一传统遭到了严重削弱。

相比前两个传统,阿里吉提的第三个传统理解起来就容易得多。阿里吉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而高速发展,恰恰在于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提倡和推荐的休克疗法,最低纲领派政府和市场自我监管等理念,而是在前面两项传统基础之上探索了渐进的改革之路,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与创造就业并重,在资本家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鼓励资本之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意)乔万里·阿里吉 著 路爱国 黄平 许安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

◎王尔德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乔万里·阿里吉的遗作,这位知名的意大利左派政治经济学家在今年6月平静离世,享年72岁,被Verso出版社誉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他曾出版过影响甚大的《漫长的21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这本遗作是前面那两本书的续集和延伸,集中讨论了决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两支社会力量: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和消亡,另

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阿里吉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将恢复到两个世纪之前,东亚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

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作者对未来世界体系的预言,而是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阿里吉将“中国奇迹”的根源与动力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历史,并将之概括为三个传统:中国19世纪以前以市场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传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和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传统。

这让人想起当代中国学者甘阳提出的富有争议的“三统说”。甘阳认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中国公羊学的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三统”。因此,我们不妨将阿里吉关于“中国奇迹”的观点也称之为“三统说”。阿里吉当然不像甘阳这样本土本土,而是更多地借助对西方资源,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传统,他把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视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主导地区的再现。

在三统中,第一个传统无疑最令人费解。阿里吉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根本差异。我们通常理解的市场是欧洲版本的,是一条市场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集中讨论了决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两支社会力量: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和消亡,另

发展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两者特点不同,在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通往无限改善的进化轨迹,而中国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和能源节约型的“内卷式”轨迹。并且,他借助贡德·弗兰克、黄宗智和王国斌等人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得出一个新鲜结论,在整个18世纪,贸易和市场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发达。因此,阿里吉认为,斯密不仅把中华帝国晚期看作市场经济的一个达到了发展高峰的样板,而且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作最应该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典范。

革命的传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主要借助了当代中国学者汪晖的研究。汪晖认为,中国的革命传统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红军形成时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发展。它具有两个主要创新:第一,列宁主义先锋党的原则得到了保留,但列宁主义暴动目标被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所取代。第二,为了寻求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给农民而不是马列理论中的城市无产阶级以优先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从什么毛泽东领导的现代化不是通过破坏,而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和教育的提升来完成的;不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国际化,而是基于以农村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特点的复兴。汪晖进一步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批判

■新书过眼

《第二世界》

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



《第二世界》 赵广成 林民旺 译 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帕拉格·卡纳(Parag Mehta)是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并负责该基金会美国战略研究课题下的全球治理倡议。他对世界看法颇为独特,把世界重新划分为新的三个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28个成员国(他把墨西哥和土耳其排除在外)为第一世界,而世界银行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则是第三世界,介于两者之间的100多个国家是第二世界。他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世界,因为最激烈、最生死攸关的争夺发生在这里,即东欧、中亚、拉美、中东和东亚等枢纽地区。这些国家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他认为,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欧洲联盟和中国正在这个市场上同美国竞争。他因此一再呼吁建立一个“三国集团”,一再强调大国合作的必要性。应该说,这个观点,超越了意识形态。

原来米勒与巴菲特殊途同归

——读《战胜标准普尔——与比尔·米勒一起投资》



《战胜标准普尔》——与比尔·米勒一起投资 (美)珍妮特·洛著 张庭珍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张晓晖

随着巴菲特稳坐世界首富宝座日久,价值投资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口中的泡泡糖。同时,巴菲特的做法也不免被教条化、绝对化,我们津津乐道于巴菲特的传统投资,以及他如何明智地回避了网络泡沫。但是,这次“股神”对比亚迪的投资又让我们大跌眼镜。

高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以及商业模式,难道我们不该关注高科技?世纪之交的网络泡沫仅仅是泡沫么?难道它发生之后,没有留下一点什么?没有改变一点什么?难道我们的投资真的只能局限于传统领域?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我们真的就无法去实践价值投资?

以网络为代表的高科技已经把地球变成地球村,从交流到购物,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鼠标,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办公成为SOHO一族,一味回避科技股,显然是不明智的。

《战胜标准普尔——与比尔·米勒一起投资》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答案。

从1991年到2005年底,米勒运作的价值信托连续15年战胜了标普指数,在美国基金界创造了空前的记录。米勒的鲜明特色是,在科技股上的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这家伙在美国在线和戴尔上赚的钱比上帝赚的钱还要多。

细究起来,米勒的投资和巴菲特曾经的传统投资不同,和彼得·林奇的“身边的机会”不同,和约翰·内夫相对保守的低市盈率法也不同。所以,一些人不理解米勒,认为他的基金不属于价值投资类型。可是,总不能说慧能的南宗是佛教,神秀的北宗就不是佛教吧?

难得的是,这本书没有局限于陈述对米勒价值信托的投资,而且还从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和许多边缘学科的多角度分析,深入探讨米勒的投资思想和哲学。

米勒毕业于哲学专业,哲学功底很扎实,这使他成为思想更加超脱实用主义者,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抛弃陈腐观念。大学毕业后,他曾担任美国陆军情报官,或许这段职业生涯让他对高科技有一种本能的兴趣。米勒很重视思辨性的东西,他曾在达菲研究院与商业领袖、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边缘学科的学者长时间、深入地讨论,“米勒满怀激情地越过篱笆汲取营养,深入研究物理学、生物学、哲学

以及心理学,然后把从其他学科学到的知识与投资领域联系起来”。对此,书中给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

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假设报酬递减的,而备受争议的新经济概念却包含着报酬递增的含义,由此,经济学便从忧郁的科学变成了愉悦的科学。

网络强迫人们形成习惯,具有消费的强迫性,使用某种产品的人越多,不使用网络的人越是感到不方便,最后,不得不使用这种产品的人就越多。

高科技企业的财富效应源于其赢家通吃的优势:你可以在皮尔·卡丹之外,卖你自己的西装牌子,但不可能在微软之外再销售一套Windows视窗。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赢家通吃,固然蕴含着较大的风险,但成功者也就有了足够的诱惑力。在各自的领域里,微软和英特尔都占有90%的市场份额,思科是80%。所以,这几家企业的股票都有成百上千倍的涨幅。

米勒认为,高科技股固然存在风险,但有些传统行业也同样有着致命缺陷:假如你在1903年就买了美国钢铁,即使历经了好几个繁荣周期,但它一直在下跌;九十年后的花旗银行股价仍然低于1929年”。

尽管米勒青睐科技股,但他对其中的风险却有着清醒认识,米勒在2000年初开始担忧科技股市场可能会坍塌,纳斯达克本月上涨了24%,而道琼斯下跌了13%,12个月内纳斯达克上涨了112%,而道琼斯下跌了3%。我感到震惊,这些数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让人触目惊心,科技股的估值明显处于愚蠢的水平。基金经理们在遵循着一个不假思索的法则,如果你在科技股上超额配置,你就会表现优异,对我来说,这是个游戏即将结束的信号”。

所以,米勒虽然是新经济的拥趸,但他的成功仍然建立在价值投资的基石之上。像格雷厄姆一样,米勒不理睬“市场先生”那变幻无常的情绪,而且更加重视安全边际,比如他曾给科技股设定出高达30%的折现率。像巴菲特一样,米勒寻找特许经营权的价值(这是人喜欢亚马逊网站的原因之一);米勒买进许多高科技股,但他也像林奇一样,买入了垃圾处理公司、超市、玩具制造商等传统行业的股票。米勒的成功并没有颠覆价值投资的原理,能力圈的原理依然颠扑不破。

就个人的气质而言,尽管米勒潜心钻研科技股,但他的个人风格属于那些朴实无华的价值投资者群体,他在读书和思考之外几乎没有有什么爱好,不过是车子房子好一些而已,当然他还享有一架飞机。

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从彼得·林奇到比尔·米勒,价值投资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丰富,但其精髓却始终未变:买进市场价格相对于内在价值大幅折价的股票。

米勒的投资经历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我们的思想和视野更开阔:巴菲特模式是唯一通向成功的模式吗?我们如何应对变化的经济和飞跃的时代?难道我们不该把触角延伸到深层次改变我们生活的科技上么?

当道教、佛教、儒教、天主教的弟子们在山下争论孰高孰低的时候,老子、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正在山顶小酌,相谈甚欢呢。

《完美的竞赛》

——“风险投资之父”多里奥特传奇



《完美的竞赛》 汪涛 郭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向初出茅庐的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与指导,帮助他们发挥潜能,现代风险投资业是经济创新的发动机。这个至关重要的行业的创始人,就是出生于法国,后去美国谋求发展的乔治斯·多里奥特。本书全面介绍了这位拥有深远影响力和超凡魅力的伟大人物,并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兴衰史为着眼点,从中透视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历程与卓越贡献。多里奥特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预知经济与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他利用自己的所有天赋管理美国第一家成功的风险投资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极大地促进了电脑、核粒子加速器、医疗设备与海水淡化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与进步。在二战结束后的美国,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培育了100多家新企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斯科、谷歌以及YouTube等等,与他都有不解之缘。

《绝处逢生》

——危机下的战略选择



《绝处逢生》 孟宪忠 著 格致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当“危机”在中国已经成了所有媒体最热门的关键词时,当人们愕然发现身边很多企业真的已经消失时,反思和求生就成了社会的主题。“危机”既有危险也是良机,而这本《绝处逢生:危机下的战略选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作者从中国传统的势、道、术、心四个方面阐释,分析了企业面临的战略挑战、战略的本质、战略分析与战略洞察以及战略的执行。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授课和研究成果的提炼,也是作者将深入企业之中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受的理论提升和总结。作者直言,在做企业的道路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最大的捷径一定是绝路。

《上市公司48大财务迷局》



《上市公司48大财务迷局》 赵明晖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本书作者 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讲师,著名财务专家,他的笔名夏草想来更为投资人熟知。他近年来的主要工作是透过公开信息发现上市公司财务问题。或许可以说,这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财务揭秘,不是搞黑人的专业水平有多高,而是他们有勇气说出真相,而这是最难,最考验人的。作者因此把贺贺男、清议、刘殊威、蒲少平等为此作过可贵贡献的几位视作为前辈,矢志不移紧盯、质疑那些上市公司中的坏孩子。本书收录了2008年IPO暂停之前发表的质疑8家公司造假上市的文章,而全书涉及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40多家。作者编了前两个排行榜:(2009年涉嫌造假追加股份十家上市公司)排名榜与2008年财报排排名榜。当然,质疑本身就是就是一种怀疑,不能当成结论,哪怕很有把握时也不能。作者只是希望以此作为提供一个识别企业报表粉饰风险的基本思路。

时代夹缝里的 中国企业生存形态

◎马铭阳

时间是最抽象的一个称谓。历史是关于时间的记录,不过历史的书写是不断地去除时间的抽象性。历史的记录将时间的轨迹具体化。

《跌荡一百年》是以百年为时间跨度的记录。记述自洋务运动到1937年商业历史的上卷已在今年1月推出,国庆前推出的下卷记述的是1938年至1977年间的中国商业历程。这段岁月因为历经战争与动荡而无比曲折,但却赋予了我们走到今天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具有别样的意义。

就像透过水晶珠帘的晃动之间,另一边人影影绰绰,可见依稀的轮廓,还有在瞬间捕捉到的衣服的花纹、眼角的丰韵或者鬓角的青丝,这些细节逐渐还原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在意识中,也许还不够清晰,但足以令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跌荡一百年》就是如此还原了那段历史的画面,在宏大与细节之间寻找平衡。大量的数据、日记、笔记、回忆、记录,以及其他文献的相互比照,令这种还原成为可能。

实际上,读者看到的并非一部关于企业的专业史,而是企业在历史中的境遇。作者的意图似乎也并非想让消费者了解这一百年里企业的发展状况,而是探寻企业发展背后的脉络,即作者不是描述企业是现在。作者通过“就好比整整106年后”、“百年之后”这样的短句将过去与现在相勾连,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呼应。

在这里,“以史为鉴”的说法也许过于“微言大义”,对时间的感慨

也可能只是来自于个体的体认,当然这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个体意识是吴晓波财经写作的鲜明特征之一。所以,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显得格外鲜活、生动。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的交织下,历史人物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对与错、爱与恨的直接产物,而独立的一个个人物正因为他们们的所作所为,才成为他们所示和所是的人。

比如在描述民国后期,国民党之所以不断溃退的原因,吴晓波关注到了经济层面的巨大差异:在晋冀鲁豫边区,杰克·贝尔登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这里的农民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国统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但是,这里的农民为了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的……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后者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护的重要原因。”这种解读不新鲜,但却一直被我们忽视。

再比如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吴晓波这股记述当时的商业现状:“一五”建成了156个大项目,这些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以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但“156工程”却最终成了一个遥远的、似乎已经消失的过去……事实上,这些苏援项目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析这些尘封往事中蕴含的秘密,在60周年国庆时,令人有种难以言表的厚重。

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关于道德与制度。书中说“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这种思考是现代社会的主题,也必将继续成为未来社会的思考主题之一,而且这个主题显然不限于商业、经济领域,每一个关照历史与现实的作者都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下)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应该能够面对。

其实,估计许多读者与我一样,透过文我更多地看到一个跋涉的灵魂和一颗悲悯的心。这种姿态来源于何处?是否同样源自贯穿文人的个体意识?至少,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来自个体意识的责任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社会责任,这是不需要额外的修为,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已成现实。

理所当然,书中的瑕疵亦不可避免。如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以欧洲战场的开始作为二战的起点,显然是欧洲中心论者的一家之言。本人认为,此处加上“欧洲战场尚未爆发”可能会更加严谨一些。

在“企业史人物”中并不总是描写人物,还有事件,人物中甚至也并不都是企业人士,它似乎是要寻找一种更具戏剧张力的结构,以此来展现对于全书阅读方式的新尝试。虽然对于李约瑟的人选一时还无法体会作者深切的寓意,因为“李约瑟难题”可能跨越了更长的时空和领域维度,也许作者是想将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背景,总之,企业史人物”的内容是否恰当,可以单论,但这个小小标题似乎欠妥。

与国外的汉学家不同,中国人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必然地带有情感因素,但这并不是说国外汉学家就自然地具备客观性,有时候他们甚至距离客观更远,虽然依旧没带多少情感因素。

吴晓波的作品已然形成自身的书写风格,当然这种风格并非其独有,也未必就是未来书写企业史或者历史的方式,但的确已成为其中的一种方式之一。